

李国涛文存

评论/下卷

只要有文字，就会有文字风格。这是由于文字创作这种个体精神劳动的特殊性质决定的。不管有没有人欣赏，不管有没有人组织，不管有没有理论上的支持，作家个人的艺术风格总是存在的。在过去的时代如此，在社会主义时代也是如此。

但是，在文字风格上就不完全如此了。由于我们过去政治生活中的某些不正之风和思潮的影响，人们下意识地，自觉、自愿、反自觉、反自愿，都无例外地，而多少不自觉地要“一致”，令人望而生畏。作家们都不大愿意被人称为“一致”。

因此，三十年来虽然我们的理论文章也宣传过文风和艺术流派问题，但具体到作家风格的问题就很少有人问津。而且具体到一个作家流派问题，如李劫人，这是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要讲风格，也要讲流派，因为这是百花齐放的结果。

在社会主义文学中是存在各种不同的文学流派的。这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我认为，以赵树理为开创者的山西作家群，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山西作家群，这种创作风格似乎不能准确，因为流派固然可以以某种标准来划分，如宋代江西诗派，清代桐城派，但现在以一言之为，作家众多，这种概念就划得不准确。过去八位在口头上曾把山西的这个流派称为“山西派”，为什么称“山西派”呢？这是综合着山西在生活和创作上的特点，又针对这些作家所属的农村生活，作品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这些特点而命名的。

文学流派从风格相近的作家形成。山西作家群，以赵树理为首，其中主要作家有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这是一批土生土长的山西作家。赵树理是在太行山区成长起来的，他青年时的农村生活经历，长期从事文学创作的工作，他开始文学创作较早，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不久，他就写了《小二黑结婚》，成为开创一个文学新时期的代表作。赵树理的作品最初在解放区风行，影响很大。山西的其他作家就是在他的影响下进行文学创作的。解放以后，有一段时期，他在北京工作，每年到一段时期到晋东来生活，从1955年开始，赵树理调回山西，长期生活在晋东。马烽、西戎等几位作家也是在晋东逐渐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早年，赵树、西戎培养和写作经历都大体相似。他们都是在《讲话》发表以后开始文学创作的，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到在晋东地区创作新。文化工作，这些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分散到全国各地，到七十年代中期，都先后回到山西工作，长期深入农村生活。这是很有兴趣的一个巧合。七十年代中期，一张报纸或熟的山西作家不约而同地回到山西作家，回到自己熟悉的农村，去继续农村生活。在这个巧合的背后，可

李国涛文存

评论 / 下卷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国涛文存. 评论 / 李国涛著.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457-0749-6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4191号

李国涛文存·评论卷

著 者: 李国涛

责任编辑: 李秋芳

责任印制: 李佳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mm × 1168 mm 1 / 32

印 张: 24.25

字 数: 470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749-6

定 价: 116.0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Index 目录

作家论与作品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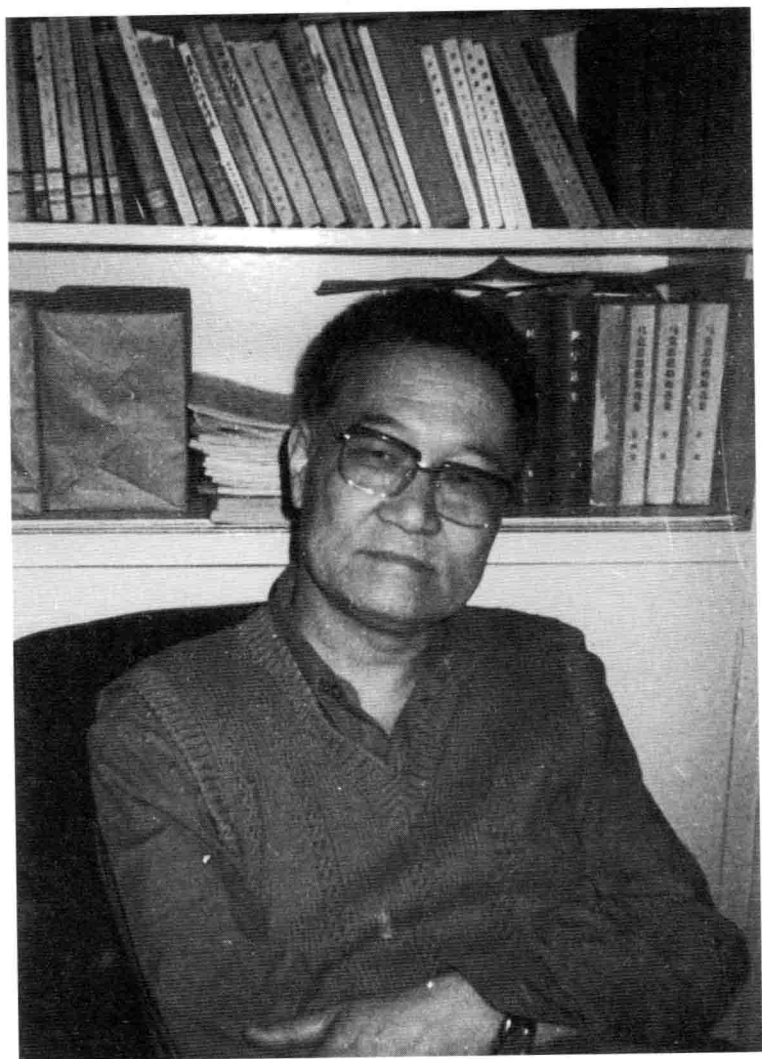
- /3 马烽论
/21 蒋韵论
/34 张石山论
/47 访成一
/59 大同的作家们
——纪念《云冈》三十周年
/70 很有光彩的《新星》
/81 论后起的山西诗界
/89 高角度近距离地扫描生活
——读报告文学《中国的要害》
/91 童心渴望自由
——汪曾祺的《职业》
/96 真实是可怕的
——评麦天枢报告文学新作《挽汾河》
/101 新颖的通俗小说
——钟道新的近作

《野草》艺术谈

- /113 《野草》索隐四题
- /128 《野草》四篇及其中的四个形象
- /138 论《复仇》二篇
- /148 寻求那逝去的青春
——《野草》中的青春组诗
- /155 伟大革命家精神生活的一角
——《腊叶》赏析
- /160 关于《死后》
- /169 关于《死火》
- /176 苦闷的“象征”
——《野草》艺术谈之一
- /189 散文语言的诗化
——《野草》艺术谈之二
- /202 《野草》纵横谈
- /212 一个正面的知识分子形象
——《呐喊》、《彷徨》里的“我”
- /221 春兰秋菊可同时
- /224 鲁迅的“国民性”概念有明确的阶级内容吗？
- /229 勇敢吸取外国艺术营养
——鲁迅、郭沫若早期小说艺术的一个侧面

STYLIST——鲁迅研究的新课题

/241	第一章	研究这位伟大的Stylist
/259	第二章	鲁迅文体的特色
/333	第三章	文体比较
/357	第四章	文体渊源
/375		后记



50岁时于家中

①

作家论与作品论

评论

下卷)

马烽论

马烽从1942年开始发表小说，于今已四十多年。

马烽写过长篇小说，写过电影文学剧本。他同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把他引上中国现代文坛，那时候他二十四岁；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取得轰动一时的效果，那时候他不到四十岁。他以后还写过长篇，还写过电影文学剧本。但是据他自己说，他最喜爱的还是短篇小说这种形式，他用最大的精力去写的，是短篇小说。所以，我在这里只从短篇小说这个方面来谈谈马烽。

一

马烽在他新近出版的一部自选集的《自序》里说，他的这些小说，“如果单就其中的某一篇来看，也许主题太浅薄，人物刻画的也不够丰满。如果整个来看的话，大体上还可看出三十多年农村的变化来”。我以为，评论马烽，评论马烽的小说创作，确实是离不开中国农村这三十年的变化。对于马烽这样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来说，这三十年的农村生活和他这三十年（实际上已是三十五年了）的创

作是密不可分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他全神贯注于农村生活，努力地探求农民思想变化的轨迹，热情关怀农村新人的成长，研究党的农村政策、农村工作的得失；这一切，使得马烽以及马烽这一类型作家的作品，带有某种程度的“史”的味道。所谓“史”，不是“史诗”，史诗太宏伟了，太高大了，不敢妄比；所谓“史”，是“诗史”，或近于“诗史”，也就是用文学来反映现实，几十年后再看，便带有“编年史”的意味。

这话从何说起呢？

请看我们这三十年的农村，有多么大的进步，有多么大的挫折，真是风风雨雨。马烽的小说大体上反映了土改以后农村经历的这些变化。从时间上来说，反映农业合作化的作品比较多，写得最为顺手，取得的成绩也较好。马烽在艺术上有所突破，是在这个时期的作品里。《韩梅梅》、《饲养员赵大叔》开其端，《“三年早知道”》成为这一时期作品的代表。1958年以后至1962年，他是在一种昂扬的情绪下写作的，《我的第一个上级》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就是由于其中包蕴着那种精神，表现出一种崇高的、忘我的境界。共产主义精神在这一个时期的生活里处处可闻可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也反映出我们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脱离实际的倾向，进而变成“共产风”。这种时代的错误，是生活于其中的任何人也难以避免的，因此马烽作品里的某些篇如《太阳刚刚出山》可以说既反映了人民的高昂的精神面貌，又带有当时的狂热情绪。

马烽的短篇小说创作，从1962年便中止下来，直到十年动乱结束以后。从1978年起，他才重新开始写短篇小说，截至目前，共发表十篇。这些作品是反映十年动乱之间，主要是反映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新气象。《结婚现场会》曾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是新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此外，《典型事例》和《彭成贵老汉》也应当是他的深化的现实主义力作。而《伍二四十五纪要》这篇小说，作为马烽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生活的概括、评价、探讨和希望，应当给以特别的注意。

小说要描写人物。在以上各个时期的作品中，马烽都创造出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许多人物令人难忘。马烽创造的这些人物，都带有鲜明的，可以说是热烈的时代色彩。所以，这些人物一旦创造出来，就立刻走进当代人们的生活之中，成为人们的同志、好友、师长或兄弟。马烽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其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占主要位置，他们在生活中曾起过广泛的教育作用。马烽近期的新作，虽然在反响的热烈方面不及以前的作品，但是所创造的人物依然是为读者喜爱的。《结婚现场会》、《典型事例》和《彭成贵老汉》都引起广泛的注意。

马烽的小说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由于它们的强烈的时代特色。马烽写的是新中国的农民，而且可以确指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山西的农民。这种时代特色，引起读者的共鸣，引起读者的亲切之感。而马烽小说的这种时代特色，是由他的革命现实主义造成的，由于严格的现实主义，马烽笔下的环境和人物，细节和语言，都极其真实，经得住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检验，经得住老农的挑剔，经得住基层干部的查考。当然，小说可能写得不成功，可能不够典型，可能不够生动。但是，保证真实而准确。情理不合、年代不符、政策上有出入，这在马烽的小说里是找不到的。马烽力图准确而真实地反映生活，他大体上达到了这种高度。

马烽密切注意农村生活的发展，他以“新”字开路，这是他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可贵之处。但是同时也就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他的创作必须同政治形势，同农村政策联系得很紧。当我们党的农村工作顺利，方针政策都正确的时候，马烽写得也顺利。也许在五六十年代里，人们很难想象党的农村工作会出现总体性的严重错误。而事实上，这种错误出现了，比如“大跃进”来了，“五风”刮起来了。这时候该怎样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作为一位党员作家，怎样处理“真实反映”和“错误政策”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来说，可能是一个过于严重的问题，一个普通作家是难以回答的，实际上也难以考虑的。但是创作的本身却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我想，马烽创作《太阳刚刚出山》时是面临着这样的情况的；还有个别当时所写而后来未收

入集的小说，也是如此。

现在看来当然是清楚了，也能作出回答：作家要真诚地、真实地反映生活，要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马烽正是由于作了这样的努力，所以他的小说能有“史”的特点。也正是由于存在着上述的困难，所以有时于“史”有欠缺之处。这是他的现实主义的命运。

说到马烽小说“诗史”的特点，我又想到《四访孙玉厚》和《一篇特写》这两篇小说。据现在所能见到的几篇发表于1959年和1960年的评论马烽小说的论文，差不多一致的意见是否定。有的说，是“在社会上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兴风作浪时”受到了影响，因而作品“不是十分健康”[1]。有的说，《四访孙玉厚》“在思想方面有严重缺陷”，甚至“流露出了非工人阶级的立场、思想和观点”[2]。有的说，“读来使人感到抑郁和阴暗”[3]。凡此种种说法，看来都是受到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因此对这两篇小说作了不合实际的批评。现在回过头来看，从艺术上讲，这两篇作品诚不算马烽小说里的上品，但是就反映生活的进程，反映生活的实际来看，它们都是真实的、准确的；而且可以看出，作者具有一颗真诚的心。

我们只对《四访孙玉厚》作一点分析。这篇小说写孙玉厚办合作社过程中的几次遭遇。1951年他已经决心要走合作化的道路。1952年他办起了五户人家的小社，秋收以后，由于增产，有二十多户人家要参加。但是这时候区里和县里不支持，由于孙玉厚的坚持，才得到地区领导人的支持，初级社才办下去。到1955年冬天，展开了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孙家寨成了“重点社”，县区的领导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让孙玉厚“立即转高级社”。孙玉厚根据实际情况，给以坚决的抵制。到1956年秋收时，孙玉厚由于辛劳，由于气愤，吐血而死。整个小说的调子是低沉的，但是一位勇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的基层干部形象给人很深的印象。孙玉厚反对浮夸，反对官僚主义；他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捍卫人民的利益。孙玉厚是正确的，马烽的描写也是正确的；而且，如果从题材本身来看，写出一定的悲剧气氛也并无不可。这是我们现在不难得出的结论，不是说本文见解的高明。不过我却以为，马烽当时有这样的看

法,有这样的勇气去写这种不合“时宜”的作品,是值得称道的。我翻阅了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指出个体农民在土改以后“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决议》肯定了对个体农业改造的道路和过程。但是也指出:“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这样对照看起来,《四访孙玉厚》在思想方面是无可指责的,甚至可以说,它倒可以作为马烽小说具有“史”的意味的论据。

二

三十多年来,马烽是作为新时代的歌手出现的。马烽短篇小说的特色和优点,就是始终洋溢着对社会主义的衷心热爱。作为一位作家,他对社会主义农村生活中的一切变化都十分敏感;作为党的农村工作者,他也十分尖锐地看到农村工作中的问题。当党的农村工作政策合乎客观的实际,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的时期,马烽的小说也以春风得意的笔调,反映出生活的欢乐。试看马烽50年代前期的小说,如《结婚》、《一架弹花机》、《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生活画面和人物形象,都是充满生机的;这时候,作家的情绪也是那样愉快,带着青年人特有的乐观,甚至天真。当然,那时候,马烽也才三十二三岁,确是一个青年。

由于我们党在工作上的失误,在农业合作化的后期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过急,过粗,过快,某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了浮夸,不注意实际效果,只图虚名,只求邀功。马烽看到了这些问题。从思想上说,是要实事求是;从政治上说,是要坚持党性;从艺术上讲,是要使现实主义深化,要面向现实,不作粉饰。因此,马烽在1956年10月写了《一篇特写》,在1957年6月写了《四访孙玉厚》。关于《四访孙玉厚》,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一篇特写》反映的是制造假“典型”的恶劣作风。“丰产田”是假造的,劳动模范是强加于人的。这

两篇小说的人物形象不够丰满，也缺少马烽作品的生动和风趣。似乎可以说，这位年轻的歌手不善于接触生活中的阴暗的一面。不，那不合他的调子。只是作家的责任感、党性原则，要求他去接触。他是勇敢地接触了这方面的问题，试探了“问题小说”的一个方面。他的“问题小说”的侧重点，在于反对浮夸，赞扬实事求是。而这样的问题正是我们党在农村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在1958年以后全国上下的狂热气氛影响下，马烽写了《太阳刚刚出山》；但是他也曾摆脱这种影响，冷静地写出《老社员》这样的小说。《老社员》写于1959年，它没有受到很多的注意。但是，茅盾却给予这篇小说很高的评价，而且以这篇小说同马烽的名作《我的第一个上级》及《太阳刚刚出山》作了对比分析。茅盾认为《老社员》不比这两篇逊色，“甚至可以说强些”。理由是《我的第一个上级》里的老田，“精神世界的描画是不够饱满的”，《太阳刚刚出山》里的高书记也是如此，因为“两个人物性格都是靠一些惊人的故事烘托出来的”[4]。这种评价也许对老田这个形象说来，未必完全合适，多年的事实证明，老田的形象在读者中留下的印象要深得多。但是，高书记的形象似乎确实不如老社员。我在这里不是要对比这三个形象，我主要的目的在于说明下面一点，即茅盾对《老社员》的评价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认为《老社员》是“反对浮夸作风”的，这个人物“是浮夸作风的坚决的反对者”。现在看来，茅盾的话切中要害。在1959年写出老社员这种人物，歌颂“磨刀背”的精神，就是在赞颂实干家，赞颂“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而这种总的调子，是同当时的浮夸风针锋相对，大异其趣的。

可以看出，从1956年以后，马烽逐渐接触我们生活中阴暗的一面。从此以后，马烽一面歌颂社会主义里的新人新事，赞美生活的欢乐和光明，一面对阴暗的、腐败的事物进行批评。他的批评经常是很婉转的，但是大都是很深刻的。马烽的现实主义在深化。也许他在当时还不是十分自觉，但是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他对自己过去的作品也看得更清楚了。1981年，他在《马烽短篇新作》的《后记》里特别说到重新收入三篇(包括《杨家

女将》和《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旧作的原因。“现在把二十年前的这些旧货搬出来,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有什么高明之处。而是因为这三篇的主题,都是歌颂那些在工作、生产中,能够实事求是,敢于实事求是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社员;同时也揭露批判了那些装门面,慕虚荣,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写得虽然不怎么深刻,但或多或少可能还是有点现实意义。”马烽的这些话是深有所感而发的。只要回顾我们三十年来农村工作的几起几伏,就可以看出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多么可贵,又是多么困难。那原因是由于我们时常脱离现实,走向片面性,甚至走到狂热的程度。

在接触农村生活和农村工作时,马烽总是特别警惕产生片面性,而赞扬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大体上成为他的小说,尤其是所谓“问题小说”的总的倾向。三十年来,他追求着这种精神。经过十年动乱,这一点在他的创作思想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我以为,马烽在1979年8月写的《伍二四十五纪要》是他创作思想的最突出的体现,要了解马烽新时期的创作思想,应当分析这篇作品。

《伍二四十五纪要》的时间跨度约三十年,涉及我们农村生活的各个时期,写了多种人物形象。在马烽的前十七年作品和新时期的作品中间,它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思想脉络的发展上,在艺术风格的变化上,都可以作如是观。伍二四十五是一个人的名字,小说开始介绍了这个名字就使读者发一大噱。似乎从《“三年早知道”》以后,马烽就没有使读者这么畅快地笑一通。伍二四十五这个人物是农村里的敏锐、机智、长于言谈、富于幽默感的那种能人。他不但“能”,而且是敢于坚持真理,勇于进行斗争的善良而正直的人。在小说里,他以“抬杠”来表达自己的见解,也表露自己的性格。小说里曾直接议论到“抬杠”,说:“抬杠实际上就是片面性”;进而又说,“他就是故意用这个片面性,反对真正的片面性哩!”伍二四十五经常用表面的荒谬来反对对方(一切不实事求是的)实质的荒谬。伍二四十五的许多言论,实际上是普通农民对错误的政策和领导的不满、愤慨、希望、责怪的特殊表达方式,是作家马烽对我们农村工作中不实事求是的讽刺。这里面寄托了很深的感慨。读者读这篇小说,始则微

笑，继之大笑，而后摇头苦笑。小说愈往后写，笑声里愈增加愤怒的感情，严格地说，幽默已变为冷嘲热讽、嬉笑怒骂了。这篇小说前后情绪的变化，使我想到《阿Q正传》。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说，起初只要写成“开心话”，而以后“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令人觉得不单是“开心”了。实际上这和内容的发展相关联。要“革命”了，要“大团圆”了，怎么能“开心”呢？《伍二四十五纪要》也有这个问题。生活中的苦难太多，幽默也要起变化；写到“文化大革命”，笑和哭都难分了，叫它“苦笑”其实还不足以达意呢。

以上，我概括地谈了《伍二四十五纪要》在马烽小说里“承前启后”的地位。如果从具体的形象、情节上探讨一下的话，我从老保管姜忠的形象上看到了孙玉厚的命运和某些精神面貌。姜忠老汉在困难时期，自己饿死，而偷偷藏下两袋玉茭作队里的籽种。特别是写到农村经济好转以后，清明扫墓时，伍二四十五提着一篮白馍去烧香磕头，这令人想到《四访孙玉厚》的结尾。坟墓是生命的终点，而生命在活人的心中并不完结。如果从《伍二四十五纪要》里几位干部的形象来看，冯有亮这位县委书记、伍二金贵这位基层干部，因为经历较深，显然都是更为成熟的干部。这些干部比马烽以前作品中出现的，是更为深沉，更懂得面向实际了。马烽新作中，《结婚现场会》里的县委书记，《典型事例》中的县委书记和支部书记，都具有这种特殊的气质。比如，什么事都爱搞“现场会”，什么事都要去“树典型”，这就搞成形式主义，搞成片面性，甚至有的干部以此作为阶梯向上爬，而不顾人民的利益。这些领导干部现在很清醒地看到这种问题，他们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小说的情节就在这些问题的处理过程中展开，形象也就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中得到发展，得到逐步的丰富。

这就是马烽小说的“史”的意味，它的人物，它的气氛，它的生活内容，在当时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以后便可起到“史”的认识作用。而实际上难道不也为马烽自己创作的“史”留下一条清晰的痕迹吗？

三

《伍二四十五纪要》本是马烽构思了很长时间的一篇作品。他回顾三十年农村的变化、农民的遭遇、党的政策、干部作风等一系列问题，根据自己眼见耳闻的种种悲喜剧，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而写成此篇。三万字左右，这在马烽的短篇小说里是最长的一篇了。这篇小说以伍二四十五为中心，塑造了多种人物形象，都是相当生动的。伍二四十五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马烽新时期的作品里成为鲜明的总主题。

《伍二四十五纪要》之前的《新任队长钱老大》已经开始写这方面的问题，塑造这种气质的人物形象。作品中交代得很清楚，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要搞农村机械化的时候发生的故事。主题也点得很明白：“无论干什么工作，也得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无疑反映出1978年底至1979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情况：彻底摆脱“一刀切”、浮夸风。

与《伍二四十五纪要》同时写成的《结婚现场会》，除了艺术上的许多优点以外，它以深刻地理解生活，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而得到较多的注意。这篇小说在处理一个十分常见的、几乎可以说是“老套子”的题材——买卖婚姻；但是作家有他自己的独立见解，有他独特的感受，对这种不良现象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描写，指出买卖婚姻的根源（至少是根源中的一个吧）是“穷”。要彻底解决它，必须发展生产。会可以开，但开会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结婚现场会》，这题目里带有不满的讽刺；从内容上看，小说也是在反对一种空喊口号、不求实效的工作作风。

这篇小说里颇富于机智幽默的语言和生动妙肖的人物描写。或许可以说，这篇小说是新时期马烽新作中的佼佼者。“老牛筋”这一类人物，被我们的小说家反复地写了多年，正像买卖婚姻的题材一样。但是，深刻的现实主义所触及的真实人生和真实形象，毕竟可以有它们的别开生面之处。故事的新颖引人，细节的生动，情节的绵密，这且不说。仅以老牛筋同县委书记的一席谈话而言，就见出